

# 江苏教育考试科研月报

2022年第3期（总第87期）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编印

学术交流

## 疫情下的教育与教育考试

**【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我国开展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停课不停学”教育。疫情下，教育教学内外影响因素的变化，给我国教育的方方面面带来诸多挑战和机遇。本期月报，以“疫情下的教育与教育考试”为主题，分享各界学者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教育与教育考试改革的思考，其中有宏观畅想，也有中观和微观描述，有助于我们更加丰富对于疫情下教育与教育考试的认识。

### 疫情下的教育

阎凤桥在《疫情后教育的“变”与“不变”》一文中认为，疫情之后教育可能会出现四方面的变化：首先，疫情期间，我们不得已启用了在线教学系统和其他网络教学系统，这给信息技术基础建设提供了一次施展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师生熟悉了它，所以我们今后会感念网络技术在特殊时期帮了教学的大忙，会善待它，并继续挖掘它的潜力，发挥它的作用。其次，这些新技术手段多数不是由学校开发研制的，而是由企业公司所为，所以教学与产业部门在此实现了一次真正的对接，这点也许会成为疫情“后遗症”的一个方面。再次，疫情期间引起很大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是，科学研究是为了发表论文还是为了解决生命攸关的实际问题，这是对科学工作者良知的一次拷问，也是对长期形成的学术功利主义的一次鞭挞。希望可以从此汲取教训，使之成为“变”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后，疫情使得我们“享受”了如此长的停课假期，但是，部分学生并没有荒废时光，他们从自学过程中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学习快乐，其效果甚至超过平时马不停蹄地听课、做作业、上补习班、考试的效果。再说疫情之后教育不变的一面。疫情过后，我们要回归常态，在强大的惯性原理作用下，思路依旧、规则依旧、做法依旧，这样的话，成绩与问题也依旧。我们今后仍然要继续面对应试教育的顽疾，要努力克服功利主义的弊端，要不断改革和创新，但是这

些都与疫情没有直接的关系。

还有一些方面到底是“变”或者“不变”，则属于更大范围的事情，取决于全社会的态度和能动性。疫情让我们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且把这种反思融入教学活动中，并进行制度化建设，这是最应该变但是最难变的一个方面。再次说明，教育的事情不光是教育系统内部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和全人类的事情。

程天君在《教育与社会的三重距离》一文中，从空间、时间和心理三方面分析了在发生深刻变革的社会图景下，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第一，教育与社会空间距离。空间距离主要体现在教育与社会“结合度”上。当全社会共同参与和支持教育时，二者的空间距离随之转变。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将教育教学从教室搬到网络，而且，随着从地理空间转向网络空间，教育不再受制于有形的建筑，学校的“围墙”被打破，教育与社会空间距离被改变。应该说，尽管这次突如其来的“教育转型”较为被动且带有实验性质，但疫情无疑加剧了教育的信息化与智能化，改变着工业社会以来学校教育的传统路径。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开始真正广泛参与，教育与社会深度融合也势在必行。为此，把握教育与社会空间距离，关键要做到“资源共享”与“合作教

育”，充分利用信息社会的资源优势，让每一个学习者都能够畅游在学校内外，共享全社会对于教育的支持。第二，教育与社会的时间距离。时间距离主要体现在教育与社会的“差异度”上，当在同一片蓝天下却出现云泥之别的教育时，相关者的时代差和时间距离随之彰显。在疫情中，既要乐观地发现城市优质学校的从容面对，又不能无视偏远农村学生的步履维艰，城乡、区域、学校之间教育资源与质量差距让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更加凸显。把握教育与社会的时间距离，要害在于要推行“均衡发展”与“公平教育”，不断开拓适合人与社会发展的有效路径，让每一个学习者都能够穿梭于知识殿堂，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第三，教育与社会心理距离。心理距离主要体现在教育与社会的“理解度”上，当撕裂的社会遭遇“共识危机”而亟待教育扭转时，二者的心理距离随之显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新冠病毒之所以非常危险，是因为它正在利用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分歧。不管这种观点是否夸张，但它表明共生共存、达成共识在处理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不可或缺。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需要通过教育形成多元文化和价值观，拒斥“唯我独尊”“单边主义”抑或“零和博弈”思维。为此，把握教育与社会心理距离，必须做到“多元共生”与“共识教育”，努力弥合日趋撕裂的社会，让每一个学习者都能够始终保持着初心，为全人类的美好明天而奋斗。

杨九诠在《“上手”还是“在手”：疫情下的教育及其反思》一文中，在对疫情下的教育进行反思的同时，对疫情下教育反思又进行了反思。作者认为，教育研究者对疫情下教育的反思，一开始持有审慎的态度，线上对线下简单的复制，就是普遍的忧虑。但

是，如果未在当下的窘迫境遇中施展实验性的、亲历性的考察，我们很可能难有实质性的获益。现在看来，实证研究，非常罕见；循证实践，不仅稀少而且浅陋，仅仅在学校管理方面有些动议层面的迹象；批判理论，并没有表现出它的实践品格，尚止于“忧校忧教”的情感表达和意见主张；对疫情下教育现象学迫近，似乎还没有发生……面对着全然陌生的情境，我们似乎并未失语，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否趋于失明？新冠疫情下的教育，是风险社会的突发事件。风险社会的变量呈现为不断涌现、沉浮与纠缠的特性，仅仅靠化小核算单位，将学校教育转移、分解到家庭到镜头前到图片视频上传，显然是不够的。影响教育的变量，早就逸出了传统教育的外延。无论是量表模型还是理论命题，企图随手拈来熟知的变量及其关系来解释和解决疫情下的教育以及后疫情时代的教育问题，都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与外延变易扩展共振的，是变量的内涵、功能、价值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形式化地运用变量，含混地处理变量的“实质性”，十有八九会犯“用前朝的剑斩当朝的官”的错误。比如，仅仅将新冠疫情视为新的教育资源供给的变量就不免乎轻慢了，新冠疫情更是将学生抛入其中的新的世界，在两相际遇中，它能够转化为学生生长的时空。作为教育资源，学生有了获得感；作为生长时空，学生有了存在感。也因为存在感，学生超越了获得感的功用性，进入到生命体验与生命自觉的境界，从而为风险社会的生存发展灌注安身立命的精神与性灵。这里也许并不存在“轻车熟路”，能指与所指正在面临着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是否对应的冲突，对疫情下的以及后疫情时代的教育，用原有的话语与方法来定义和订正已经不够了，必须在新的际遇中，重启对话，重构概念——对教育学与教育研究来说，这是挑战，更是机遇。

## 疫情下的教育考试

徐光木、胡波在《基于区块链的在线考试协同治理模式探索》一文中认为，后疫情时代，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在线考试日渐普及。但是，它在展现出强大生命力的同时，也陷入诚信困境，因此不被主流考试所接纳，难以摆脱边缘化的地位。区块链技术的出现，给在线考试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区块链始于2009年初诞生的比特币。伴随着人们对区块链了解的增多，其所具有的去中心化、

不可篡改、信息加密等特征推动人们开始将其应用于其他领域并迅速得到扩散。区块链对在线考试的制度重塑包括以下方面：1. 舞台重塑——从“主导考查”到“自我展示”。当前，伴随着学习方式的转变，学生已经从传统的“要我学”开始向“我要学”转变，既包括主体层面的主动学习，也包括对象层面学习内容的自主性。与之相应，基于区块链的在线考试也逐步从考试管理机构主导下对考生进行

考查、考生被动参与的舞台,演变为考生充分展示自我才能和价值、考试管理机构见证这一过程的舞台。考试主客体的位置变换蕴含着深刻的变革机遇,例如预约考试(包括考试时间和考试项目)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成为一种常态。

2. 模式再造——从“单一中心”到“一心多极”。区块链的特殊性在于,其不仅仅意味着传统组织可以利用该技术改变组织结构或流程,更意味着传统组织本身可能会发生变化乃至被替代。在信息化背景下,基于区块链的在线考试在充分尊重单一中心化组织的前提下,借助观念更新、技术改善等,对单一中心化组织下的考试管理模式进行改进,实现“一个中心”框架内的“多极治理”。该模式可以适用于两个场景:一是位于不同或相同层级的考试管理主体间的多中心协同,各级考试管理机构就某一问题充分讨论,共同决策;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多中心化,主要特征是将考生节点纳入中心节点,使考生能够参与考试管理和决策。

3. 信息共享——从“信息专有”到“信息对称”。考试管理从“单一中心”转向“一心多极”之所以可能,正是基于区块链的开源性,相关各方获取信息的途径不再是通过对方的施舍与让渡,而是信息本来就既归别人所有,也归自己所有。考试信息的专有属性被打破以后,不同层级的考试管理机构之间、考试管理机构与考生间的信息不对称在极大程度上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信息对称前提下的协同治理,考试管理机构单纯依赖信息掌握方面的优势地位对考生实施管理的情况将一去不复返,考试管理机构唯有调整管理思路和方法,与区块链主动对接,理解和掌握这一技术,才能与这一趋势相适应。

4. 监督交互——从“单向监督”到“监督闭环”。区块链具有强大的社会透视功能,使隐藏在“隐形斗篷”下的权力滥用行为无处可藏,每个节点相互制约、监督,形成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自治网络,使得公共服务更加公平、公正、可信。基于区块链的考试信息共享机制一旦建立起来以后,考试管理机构与考生之间的监督将会无时无刻不在。一方面,所有信息只能在经多数节点确定以后才能完成上传步骤,考试管理机构的确认权将演变成包括考生节点在内的投票权,而且考试管理机构与单个考生的投票权相等。另一方面,考试管理机构习惯性的“选择式监管”“抽样式监管”工作方式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考试管理机构在选择性地监管一部分考生的同时,被监管和暂时没有被监管的考生也在监管考试管理机构。当自上至下的单向

监督演进为信息对称前提下的双向监督时,就意味着多主体监管反馈参与机制得以建立,维护考试公平的信任生态得以形成。

汪基德等在《疫情期间硕士研究生招生网络远程复试:模式、问题与改进》一文中提出,疫情期间硕士研究生招生网络远程复试既是特殊时期的应急之举,更是深化研究生招生改革的一次探索,是互联网时代创新人才选拔方式的一次新尝试。作者通过对13所高校公布的硕士研究生复试方案文本进行梳理与分析,发现研究生招生网络远程复试有远程实时问答、远程网络笔试和远程技能测试三种模式,并呈现出内容多元、形式多样、平台种类丰富、灵活便捷等独特价值。此外,网络远程复试还存在网络拥堵与卡顿、缺乏适用的专业在线考试平台、作弊风险较大、考试机制有待完善等现实问题。基于此,作者提出改进策略:

1. 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解决网络拥堵与卡顿问题。一是要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二是要加快建设教育专网,满足常态化的网络测评需求,如VR虚拟实验、全息虚拟测评、AR远程交互等;三是改造和升级校园网络环境,并加强相关人员的教学培训,以确保远程考试的顺利实施。
2. 优化在线考试平台,发挥专业远程考试平台优势。结合网络远程复试的具体需求,进行考试内容、考试评价、系统安全的综合考虑,设计出适应网络远程复试的高效便捷、功能完善的专业远程考试平台系统,提高网络远程复试的质量,确保复试的真实性与公平性。首先,根据学科内容建立领域知识图谱,对海量题库进行科学分类,结合考核重点建立专业试题库并对其进行定期维护与更新;系统根据题库自动组卷,动态随机发布试题,短时间内同时生成多套高质量试卷,支持大规模考生同时在线进行考试。其次,根据先前制定的考核评分标准,系统依据考官输入的评分,即时生成考核结果,并智能化、全方位地对考试内容和结果等进行分析,提供客观、准确、科学的统计结果。同时,系统对考生成绩进行精确统计和存储,为考试后的检查与回溯提供可靠保证。最后,根据网络、数据库及敏感信息的安全要求,集成身份认证、权限控制、数据加密、数据库恢复等功能模块,确保考试信息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3. 发挥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考场的作用,解决现有在线考试平台缺乏监控的问题。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场完善了考生身份验证系统、视频及网络监控系统、作

弊防控系统、考试综合业务系统以及应急指挥系统等科学系统的建设。国家标准化考场前端通过摄像机、拾音器等设备对视音频信号进行采集,各楼宇设置分控机房,敷设各考场的视音频线缆,完成编码存储,并接入校园网;主控中心通过网络管理系统设备,对接收的数字视音频码流进行处理解析,并转发至上一级平台。主控、分控及教室终端用户都可以选择教室,结合在线监控平台,实现网络巡查、远程实时监考等功能。将专业的远程在线考试平台与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场结合起来,可以克服现有在线考试平台无法监控网络远程复试环境的问题。

4. 采取远程开卷考试模式,遏止作弊动机。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人类借助技术手段可以更方便地获取各种知识,开卷考试可以有效地引导学生利用各种工具获取信息,并发展其信息加工的能力。开卷考试重视对考生逻辑分析能力以及综合能力的考查,也符合研究生复试招生考试对人才选拔的要求。疫情期间,部分招生单位采用开卷考试进行网络远程复试,设置灵活开放的题目,有效地抑制了考生的作弊动机,提高了考试质量。

5. 强化能力素质考核,杜绝作弊行为。研究生招生的初试比较注重对考生理论知识的考核,复试则需转变考试目标的着力点,从关注理论知识转变为以能力素养为核心,是新时代研究生复试和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6. 制定网络远程复试标准和实施规范,保障远程考试质量。一是要合理设置专业知识、技能、思政及综合能力等考核内容的评判策略与权重规则,加大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比例,尊重学生发展规律,强化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行多元素质教育评价,使复试能够客观全面地对学生进行测试。二是合理设置考试的题型与任务量。网络远程复试题型要以开放试题为主,充分引导学生动手实践并启发学生思考。任务量的设计除考虑专业特点、考核目标外,还要考虑学生实际情况、平台支撑功能等因素。综合多方因素,合理设置复试的任务量和时间,便于减轻学生考试负担,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三是对考场环境作出规范性要求,利用技术手段防止作弊的发生。

李琳娜、时悦琪在《后疫情时代教育考试舆情的特点及应对措施》一文中,针对后疫情时代教育考试舆情具有的内容敏感性、传播复杂性和事件爆

发性3个传播特点,认为教育考试舆情应对坚持日常预警、及时回应、公开透明3个原则,并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一是转变传统思维观念。在教育考试舆情信息处置中,把监测与预防作为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方法,转变传统的大家长管理观念,代之以更加人性化与亲民的方式,将风险扼杀在摇篮里。教育考试主管部门应当增强与公众和媒体的沟通,做到知网、懂网、善于用网;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政务、信息公开更多地转向上线传播方式,媒体尤其是网络新媒体相较于以前的角色更加重要,教育考试主管部门必须充分用好网络媒体,在舆论事件中掌握主动,从而引导考试舆论向积极的方面发展。二是建立舆情分析处置专家智库。培养一批既懂理论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育考试舆情应对分析专家。在教育考试舆情周期来临时,抽调相关专家,组建舆情风险防控小组,使教育考试舆情应对走上正轨,成为国家教育考试常态化管理的重要一环。三是提高应急处突能力。应急处突不仅是解决一次突发舆情,提高风险意识更为关键。在后疫情时代,教育考试部门应提升自己的风险意识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一旦发现涉及教育考试舆情的信息,应迅速作出判断,积极协调各部门及各种社会资源,及时处理相关舆情,引导社情民意与舆论走向。四是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系统。通过对自然语言的识别处理,将人工智能技术与人工经验相结合,识别当前教育考试舆情模式,从而给出合理的舆情处置流程与可选方案。五是提升媒体与公众的传播素养。在人人皆是自媒体的时代,媒体与个人在信息传播的能力上已经趋同,个别“大V”和“意见领袖”在信息传播中的影响力已相当于一家网络媒体。因此,应当使媒体和公众意识到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要谨慎行使语言的使用权,对于煽动民意、歪曲事实的要依法处置;同时,应推动出台与网络环境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快整治网络环境。六是建立教育考试主管部门、各类媒体及社会公众三方协同互动机制。教育考试管理部门在做好信息公开的同时,要主动做好政府与公众,以及公众与公众之间的沟通,让有效的正确信息得到合理的传达。媒体和公众也应当自觉遵纪守法,承担社会责任,为建设良性发展的教育考试舆论环境贡献力量。